

今日视点

承认“收入被拉高”的市长值得鼓掌

近日,各地“两会”逐渐进入高潮,相关的新闻越来越有看头。1月18日,昆明市委书记仇和指出:“高房价背后是巨大的腐败”。1月19日,南京代市长季建业在说到富民问题时表示:“其实我很清楚,60%的百姓口袋里并不达每年公布的收入平均数,是被拉高的。”

实事求是地说,季建业只不过和仇和一样,说出了一个公开的秘密,但正因为这些公开的秘密长期被各级官员刻意回避,所以仇和和季建业才显得可贵。

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,这是认知和态度问题,至于不能解决问题,那是能力问题。比如说饱受百姓诟病的高房价问题,要一下子解决,可能难度确实比较大,但勇于承认“高房价背后存在巨大的腐败”,相比于“高房价是丈母娘造成的”、“离婚推高的”、“中国人太有钱了”等让人听了想骂娘的“雷语”,至少让人听了心里舒服许多。

承认问题,找到了问题的症结,就有了解决问题的希望。因此,无论问题将来能解决得怎么样,能够承认和说出“公开秘密”的官员,都是难能可贵的,至少,他们并没有迷失于表面的统计数据,时时刻刻惦记着真实的民生。

国际公认的健康社会结构,应该是“橄榄形”的,即超级富人和超级穷人都很少,中产阶级应该是社会的主流。而我国“亚健康”或者“不健康”的社会结构,已经被专家学者多次提出。

统计学本身就是一个数字游戏,在统计学里面要避免“被”是很难的,问题是我们不能无视统

计学里面的“被”,而自以为是沾沾自喜于平均数。我们应该发挥统计学的数学分析功能,透过纷繁的数字,直击问题的要害。

“六成民众收入被拉高”,确实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,我们希望南京代市长季建业在难能可贵地说出统计的公开秘密之后,也能够率先实践更真实更细致的统计(比如之前已经开始做的,把农民工纳入失业统计),真正让“收入被拉高”的情况彻底绝迹,为全国走出类似的统计数字迷局,开一个好头。(郭文婧)

视点链接

老百姓收入“被拉高”,都是平均数惹的祸。究其根源,却是分配关系不合理、收入水平偏低,更是经济结构不合理、体制改革不到位造成的。如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偏低,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,这与经

济结构有关。一些政府相关部门、专家和公众其实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,不久前广州、深圳都提出了工资倍增计划,遗憾的是,这似乎仅仅是表达一种良好的期望,在一些利益集团甚至相关部门“金融危机不适合再增加工资”的影

响下,也没有了下文。

“张家有钱一千万,九个邻居穷光蛋。若是拿来一平均,个个都是张百万”。公众收入的“被拉高”容易从技术上解决,但思想上围墙的拆除却步履维艰。提高国民收入从现实来看有助于对消费

产生直接拉动作用,从长期来看,更是“民富则国强”的源头。而这一切,需要从最低工资调整、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倍增计划等细节做起,更需要解放思想、大胆创新。因为,富民,首先要先拆除“思想上的围墙”。(田力)

南京也期待着工资倍增计划

中国观察·鲁宁专栏

反对“小贩解禁”的副市长让人心寒



在执法中暴力事件频发的今天,城管委向副市长提出对小贩网开一面,是因为身为执行者的他们,也清楚看到了城管潜藏的巨大社会风险,他们希望在管理制度上缓和矛盾,但副市长的断然拒绝,却可以看出,他离真实的民生有多远?

本周一至周三,相继有三条新闻在寒冷的冬日刺痛着社会的神经。

本周一,上海闹市街头,一名市容协管员与街头小贩发生争执被当街刺死。

1月20日《新京报》消息,下岗失业者夏俊峰摆摊遭沈阳城管殴打,夏俊峰随后被带回城管局处

罚,争执中刺死两名城管,被沈阳中院以故意杀人罪一审判处死刑。

同一天的《广州日报》报道:广州市城管召开年终总结暨新年工作部署大会,会上,广州市城管委向分管城管工作的常务副市长苏泽群提出“设置一些过渡性临时摆摊摊区”的动议,被苏副市长当场否决。

在前两条新闻中,几个家庭

家破人亡。在后一条新闻中,广州城管委的建议,可以看做是城管寻求从管理模式上缓和矛盾的努力,至于分管副市长当场否决,却反映出各地政府尤其分管副市长(区长)已经陷入“市容大于一切”的习惯思维,让人遗憾不小。

站在小贩的角度,政府开办的市场摊位太少,竞拍摊位收费极高,税费又多如牛毛,而一家老小却天一亮就得吃饭,于是,只能上街躲城管,一旦肢体冲突失控,往往命案收场。

就城管而言,不时遭遇“损兵折将”且每每遭到舆论猛烈抨击。其实站在风口浪尖的城管何尝不知民心向背,可当的就是这份差。于是,城管就有减缓冲突的本能

意愿,才有以上对小贩“网开一面”的动议。

副市长当场否决“网开一面”,其实是对民意的严重误读,是对民生的极端漠视,经常被“证恶”的城管制度,现在连执行者都不愿再继续下去了,身为分管的副市长,难道就一点都不顾小贩乃至城管队员的死活吗?为了“政绩之脸”,真的就可以什么都不顾吗?

解开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恩怨之结,并非无解。小贩养家糊口的生存权远大于市容整洁的需求,对他们睁只眼闭只眼是最现实的选择。道理谁都明白,但从连网开一面都断然拒绝的副市长来看,官念的进化还远远不够啊。(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)

相关评论

在拒绝了城管委的建议后,苏副市长还说出了更雷人的话:广州其实有很多市场很多商场可以招租,可引导摊贩到这些地方去做生意。

什么叫“鸡同鸭讲”,这就是。广州城管部门的建议若得到很好执行,局面显然三赢:既遏制摊贩乱摆摊给市容及市民生活带来的骚扰,又给“走鬼”一个较为稳定的谋生之地,同时纳入有效管理序列。我不知道,苏副市长为

何会将旨在结束“乱摆卖”的建议活活读成“会导致对市民不负责任的乱摆卖”?是一时不小心,还是打内心深处就排斥小摊小贩以及一切与他们有关的意见建议?

在报道中,苏副市长的“像广州这种大都市没地方给人乱摆卖”这句话透露了无限丰富的信息,换一个句式,这句话分明就是:这座日益繁华与体面的大都市怎能容忍小摊小贩的存在?顺着这个逻辑,自然就是不断驱赶

摊贩了。只是苏副市长忘了,驱逐摊贩的政策在各大城市似乎都不见效,不断上演的却是城管与摊贩关系恶化的悲剧。

广州城管明白了“堵不如疏”的道理,本着解决而非恶化问题的初衷提出以上建议,这似乎可部分修正舆论对城管的成见——并不是所有城管都铁定要与摊贩“不共戴天”,也不是所有城管都缺乏对底层人群的体察之情,问题在于:他们只是执行者,

而掌握决策权的官员与摊贩群体隔得太远,缺乏起码的感同身受,因此也就不可能拥有类似体谅摊贩谋生不易的情怀,进而理性寻求解决之道。

苏副市长的这番话,让人仿佛回到那个白痴皇帝——晋惠帝的时代,百姓没有饭吃,他郑重思考后提出一个办法:“何不食肉糜?”还是网友的跟帖说得畅快:有钱去商场做生意,谁还会去摆摊,你当人白痴啊?(修仰峰)

媒体思想·刘洪波专栏

无视民权者应“缓当”政协委员



政协委员固然可以畅所欲言,但作为一个政治人,他必须为其言行承担政治后果,提出“考试不过关缓发准生证”这种藐视民权、曲意承欢的建议,建议人还有资格继续当政协委员吗?

重庆市政协委员王小波建议:“在夫妻办理准生证的时候,就应该设置一个家庭观念、伦理道德的考核或考试,不达标就缓发准生证!”

这个建议是在重庆市政协会议上正式提出的。参政议政,应该不是玩笑,但王小波委员这个建议,我看可以竞争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笑话,只是它不

仅可笑,而且可怖。

计划生育政策只能用于限制生育行为,并不附带其它功能。王小波委员的提议,却对生育控制进行了新的捆绑,哪怕这种做法能够“产生明显效果”,也是绝对的恶。这一建议的荒谬性,在于它对人的权利的蔑视。

如果王小波委员的建议,是与市民进行商量,那么,即使荒

谬,还多少有一点“民本”的意思,因为那表明建议者还知道生育权属于个人。但王委员的建议是直接提供给权力方的,这就很可怕,因为他根本无视人的权利。

“考不过不准生育”,这是世界上最专制的权力也想不出来的套路。这样的建议可以堂而皇之在政治协商中出现,恐怕没有什么建议是不可以提的了,只要建议者觉得“有利于社会管理”就行。

政协委员,固然可以畅所欲言,提任何合理或者不合理的建议,而不必受到法律的控诉。然而,毕竟政协委员是一种政治职务,作为一个政治人,并非不需要为其言行承担政治后果,提出这种藐视民权、曲意承欢的建议,难道建议人

还有资格继续政治生涯吗?

每年从全国到地方的两会,都会出现“雷人”建议或语录,其中既有大力推进公民权利的,也有一些背离公民基本权利,笼统称之为“雷人”,实在是混淆是非。如通过增加生活成本提高城市门槛从而限制人口流入之类的建议,难道不是逆流,难道有基本的“政治正确性”?敢言是要对制约权力无所畏惧而非对削弱民权无所忌惮,代表委员的“言论豁免”是豁免法律责任而非不承担对公民所委托的政治责任。

我想,不是“道德测试不合格者应缓发准生证”,而是无视民权者应缓当或者不当政协委员。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)

公民发言

《柳叶刀》能否攻破学术造假的厚脸皮

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与中国有关的学术造假事件,已经引起了国际学术媒体的广泛关注。近日,权威的《柳叶刀》和《自然》杂志分别以社论的形式对中国的学术诚信提出质疑,中国学术界国际信誉受到较大影响。

(1月20日《南方日报》)

国内学术研究的诚信度如何,国人心知肚明。远的不说,单看去年3月,浙江大学李连达、贺海波论文造假;4月,上海大学博导陈澧勾因论文抄袭被撤行政职务;5月,东北财经大学2007年某篇硕士学位论文,与南京财经大学2006年一篇硕士学位论文雷同;6月,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被曝涉嫌抄袭……《柳叶刀》和《自然》杂志的质疑,只不过是又一次印证了国人的判断而已。

平心而论,学术造假是学术圈的通病。不只是我国,国外治学者中也不乏沽名钓誉、弄虚作假之徒。号称韩国克隆之父的黄禹锡,不就是因为造假把自己送进了“班房”吗?所以,这就不由得我们不思考,为什么单单是我国的学术诚信遭到了国际质疑?

原因其实也很简单,很多国家虽然也会有学术造假行为,但造假者一旦被曝光,将会受到严厉的处罚,甚至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。

反观我国,学术造假即使败露,总能大事化小,小事化了,最多也只是几个小鱼小虾背背“黑锅”。例如,浙江大学李连达、贺海波论文造假事件,中国工程院院士、浙江大学药学院院长李连达仅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,不再续聘,仍可以继续在国内圈内逍遥自在;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被曝涉嫌抄袭一事,至今仍副校长照当。如此一来,谁还愿意潜心治学?

名誉对一个人、一个团体、一个国家都至关重要,好名声难得,坏名声易求。我们的学术界必须认真对待国际学术质疑了,若再继续痴迷于学术造假,等到人家都懒得跟我们玩的时候,那就麻烦了。(李志军)

热点纵论

“晒”接待品 “晒”不出意外结果

遵义一企业职工在街上“晒”厂里各种昂贵的接待品。他们说,这些物品原来存放在厂领导办公室隔壁储藏间,现在搬出来是打算让大家见识工厂的公款吃喝。(1月20日《重庆晚报》)

接待品被“晒”,让人不由得生出“一丛深花色,十户中人赋”的感慨。这场意外的戏,一方面暴露了该企业领导在公款吃喝上的挥霍无度、肆无忌惮,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领导和工人之间的隔阂已经有多深。难得这些工人团结一致,完成了反公款吃喝的一次壮举。不过,说白了,这一壮举,也不过是一次大胆的举报而已。举报,还是期待着上面予以解决。我天真地想,如果每个单位的员工都能像该企业员工那样,对公款吃喝零容忍,都能够不畏强权,拍案而起,那么,制止“三公消费”,也许会有起色。

当然,不是所有公款吃喝的单位都像遵义那家企业那样嚣张,直接把所谓的“接待品”堆放在一个显而易见的仓库里。他们也许会做得十分隐秘,不留痕迹。遵义这家企业,只是把“喝什么”的问题暴露出来了,他们吃什么,玩什么,你却看不见,摸不着。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——对那些不易觉察的“三公消费”,大家该如何起来抵制,怎样有所作为?

我深深知道,对于遏制公款消费而言,仅有民众偶尔的一次行动,是很难有什么大作用的。如果不能从根子上搞清公款消费与腐败之间的界限,如果不能通过制度保证公务开支完全透明,那么,公款吃喝之分就不会有根本遏制的一天。据说,“晒”接待品已引得遵义市政府有关领导赶往调查,但能查出个什么结果呢?老实说,我还真不抱什么希望。(宁海)